

日本基督教会战争责任初探^{*}

徐炳三

内容提要 1931—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基督教会积极鼓吹侵略扩张理论,为日军军事行动提供服务、协助日本控制沦陷区基督教会,有力地配合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虽然日本教会政治态度的形成有很多客观原因,但其行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其战争责任不可推卸。

关键词 日本 基督新教 战争责任

早在1549年耶稣会士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就将天主教传布到日本,但直到1858年《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后,西方新教传教士才得以在日本立足。虽然基督新教传入日本的时间较晚,但在西方政治势力的庇护下发展十分迅速,到了20世纪初已经形成以日本基督教会和日本组合基督教会两大教派为主,圣公会、浸信会、安息日会、公理会、公会堂、路德会、救世军等教派为辅的传教局面,新教协调机构日本基督教联盟也在1911年建立起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政治高压、民族主义、国际局势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日本基督教主流逐渐抛却了基督教的和平仁爱精神,走上了配合侵略的道路。这一史实引人瞩目、发人深省,然而我国学术界相关的研究成果却非常有限^①,学者们虽然对日本利用宗教侵华问题有过一些探讨,但关注点基本都在佛教和神道教方面,战时日本基督教的情形大都被忽略。故此,本文拟就日本基督教的相关问题展开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客观地说,日本基督教会并非一开始就支持穷兵黩武的政策,他们在呼吁和平方面也曾有过积极的表现。早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日本教会中就出现过和平社团,社团中的一位成员甚至因为在军训时宣扬和平主义而被勒令缩短了训期。^②日本基督教领袖内村鉴三也极力反对

* 本文系章开沅教授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代东亚基督教运动比较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5JJD770114作者为该项目子课题的承担者之一。

① 目前我国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大致有:孟国祥:《日本利用宗教侵华之剖析》,《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李英武:《东北沦陷时期的基督新教》,《东北亚论坛》2001年第2期;邢福增:《王明道与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沦陷时期教会人士抵抗与合作的个案研究》,《建道学刊》2002年1月第17期;解成、吴丕清:《抗日战争中的河北宗教界》参见网址<http://www.xs.k.com/html/shgc/zgsls/2005-10-23-19339.htm>;程力:《伪满时期伪当局宗教统治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等。这些成果虽涉及日本基督教侵华问题,但具体内容相当有限,且多有舛误。日文方面的相关成果多散见于日本基督教史著作中,与战争时期日本基督教在华问题直接相关的代表性著作有:韩哲曦:《日本の満州支配と満州伝道会》,东京:日本基督教團出版局1999年版;飯沼二郎编:《熱河宣教の記録》,东京:未來社1965年版;相沢建司:《宗教者の戦争責任》,东京:1995年版等。

② Esther B. Rhoads “The Peace Movement in Japan”, *The Japan Christian Year Book*, Vol 30 (1932), p. 39.

此次战争,发表了很多和平言论。^①就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的5月份,日本宗教界还在东京召开了一次和平会议,表达利用国际条约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美好愿望,基督教会是这次会议的重要参与者。^②但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形势迅速发生逆转,此后虽然我们还能听到一些日本基督徒对日军批判的声音,但这种声音已经非常微弱,更多的则是将战争责任推向中国一方。如日本牧师林三喜雄就曾在《福音新报》上发表了一篇为关东军辩解的长文,明确地指出:“我直率地断言,这次事变是中国军阀多年来有计划地实施排日行动的结果。”古屋孙次郎、清水安三等日本牧师也在《基督教世界》上发表肯定战争的言论。^③而日本基督教联盟在九一八事变的声明中只论和平,不谈战争责任,实际上默认了日本的军事行动。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成为日本基督教界全面倒向战争的转折点。1937年7月22日,日本基督教联盟发表《非常时局有关声明》,该声明包含4个要点:“一、值此图谋国民精神的作兴之际,念及吾等基督徒之责任不轻,须更加努力。二、为了对吾皇军将兵的劳苦表示谢意,而开始慰问事业。三、希冀以最低限的牺牲早日解决时艰,四、盼望以是作为一期永久的亲善关系能够得以建立,在此切望全国基督徒热诚的祈祷。”^④继此声明之后,联盟又分别于9月15日和11月24日发表补充声明,三者构成日本基督教联盟对卢沟桥事变意见的宣言。这三份声明完全肯定了日本侵华的“正当性”,并出现了“日支提携共荣”、“亲善协作”、“排斥无神无灵魂的唯物思想”等字样,这说明日本基督教联盟已经接受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中日提携”、反对共产主义等理论;而声明中又多次出现号召日本教会慰问日本军队、参加“国民精神总动员”、“精神作兴运动”等,表明日本教会在行动上开始对日本侵华大力协助。除日本基督教联盟外,日本其它教派也纷纷发表支持战争的言论,如日本组合教会曾发出《支那事变有关声明》和《处于时局的协议》,其论调大体与日本基督教联盟一致^⑤;而圣公会在其文章中甚至断然说于“此次事变是圣战”,为日本侵华提供宗教依据。^⑥至此,日本基督教界开始倒向日本侵略势力,滑向军国主义的深渊。

1937年7月,日本政府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以鼓动日本国民起来支持侵略战争,日本教会不仅在舆论上对该运动大加赞赏,而且用实际行动对运动进行声援。首先日本基督教联盟编辑出版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宗教运动资料若干辑,从理论上阐明基督教与日本对外战争的关系。^⑦接着联盟又制定了参加总动员运动的详细方针,对日本基督徒的具体行动进行指导。其实施纲领大致包括:1. 透彻地认清大局,使基督教理想与日本的根本目标保持一致;2. 支持日本提出的大东亚新秩序理论,用国际正义、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经济结合等理论指导基督教;3. 恪守兴亚奉公日,开展宗教仪式,祈祷皇室和国家的昌隆,用信仰觉醒推进国民精神;4. 协助实现经济国策,从事活用物资、节约消费、力行储蓄、更加勤劳、加强体力改良风俗等活动;5. 从事慰问将士的家属、慰问伤兵、执行慰灵典礼等后援工作;6. 到前线慰问日军伤兵;7. 通过日本基督教女信徒在北京等地

① [日]相沢建司:《宗教者の戦争責任》,東京:1995年版,第34—37页。

② Esther B. Rhoads “The Peace Movement in Japan”, *The Japan Christian Year Book*, Vol 30(1932), p 38

③ [日]韩哲曦:《日本の満州支配と満州伝道会》,東京:日本基督教團出版局1999年版,第24页。

④ 日本基督教團宣教研究所教團史料編纂室編:《日本基督教團の成立過程:(1930~1941年)》(日本基督教團史資料集,第1卷,第1篇),日本基督教團宣教研究所1998年版,第181页。

⑤ 《宗教調査資料第7輯:基督教調査報告書》,(偽)民生部厚生司1940年版,第327—328页。

⑥ [韩]澤正彦著,金銀譯:《日本キリスト教史:韓国神學大學講義ノート》,東京:草風館2004年版,第120页。

⑦ 几种有代表性的资料如海老澤亮:《興亞の使命と基督教》,日本基督教連盟1939年版;海老澤亮:《事變下の基督教奉仕事業一斑》,日本基督教連盟1940年版;釘宮辰生:《精神報國と基督教》,日本基督教連盟1940年版;釘宮辰生:《新時代と基督教》,日本基督教連盟1940年版;釘宮辰生:《國民精神總動員と基督者》,教会合同有志会1938年版,可见当时支持战争在日本基督教界具有普遍性。

开展的医疗机构强化与中国民众的提携关系；8. 在占领区与各国基督教事业的联系，增进对新事态的认识；9. 努力缓和国际舆论，通过沟通加深国际社会对日本的理解。^①

以上方针并不仅仅是一种空谈，而是在日本教会中切切实实得到贯彻的有效方案。自事变爆发以来，日本教会在中国的活动十分频繁。事变后日本基督教联盟的海老泽亮、小崎道雄、阿卜义宗、田川大吉郎、真郭赖一等人到中国沦陷区慰问^②，1938年春又有几个日本牧师到沦陷区访问，其行动引起中国信徒的疑虑和西方传教士的批评。^③事变后联盟向日军发出“感谢状”，派信徒展开慰问活动，在中国沦陷区为日军服务。如日本教会在天津开设的“休息室”，包括一个阅览室、一个书房、一个日本人浴池、一个理发店和其他设施。其1938年8月报告的数字如下：为147427人提供茶水，为83993人提供洗浴，为46871人理发，为士兵提供明信片80000张，提供《神国周刊》36000份，分发《圣经》50000份。日本基督教联盟的妇女队还建立了一个服务中国人的社交中心和诊所，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被派遣到那里工作，希望通过它来赢得中国人的好感。^④安抚士兵家属的工作在日本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938年底日本教会与东京总动员部合作，邀请受伤士兵和失去亲人的家庭在市政大厅举行了一场圣诞仪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各地基督教组织都努力与当地官员密切接触，积极推动宗教仪式的开展。^⑤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基督教界彻底地与日本政府站在了一起，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忠实拥护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几个月里，日本基督教联盟还与美国新教各派保持友好往来，两国教会领导人几次召开会议宣布和解、宽容和仁爱的精神，但是战争一爆发，日本基督教团立即宣布要歼灭英美各国，态度转变之快令人惊诧。^⑥一些日本基督教思想家开始公开地用基督教的理论去阐释日本的侵略政策，如小崎道雄、八代斌助、海老泽亮等人都曾著书为所谓的“大东亚建设”和“日华提携”等反动论调鼓吹。日本基督教团也开始号召亚洲的基督徒要信赖日本做亚洲的盟主。1944年复活节，教团发出《日本基督教团寄送大东亚共荣圈内基督教徒之书函》在书函中教团将西欧基督教视为亚洲的共同仇敌加以攻击，同时极力盛赞日本天皇制国体，大力支持将日本视为亚洲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书函中还宣传要坚持贯彻日本国体的本义，坚决排除个人主义、自然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西欧思想。这篇书函显然是一篇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日本政策的宣传品，对于被侵略国家而言其影响是极其恶劣的，也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基督教会的名声。^⑦

二

日本基督教会配合日本侵华的另一种形式，是在日本军政势力的支持下控制沦陷区的中国教会，通过控制中国基督徒影响沦陷区社会。

日本教会对华传教活动开展得较早。1903年就曾日本教会在天津活动，其后公理会进入青

① 日本基督教团宣教研究所教团史料编纂室编：《日本基督教团の成立過程：（1930～1941年）》（日本基督教团史資料集；第1卷；第1篇），第172页。

② 〔日〕相沢建司：《宗教者の戦争責任》，第79页。

③ Akira Ebisawa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and Its Work”, *The Japan Christian Year Book* Vol 39 (1939), p 257.

④ Akira Ebisawa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and Its Work”, *The Japan Christian Year Book* Vol 39 (1939), p 256.

⑤ Akira Ebisawa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and Its Work”, *The Japan Christian Year Book* Vol 39 (1939), p 257.

⑥ 呉利明、鄭兒玉、閔庚培、土肥昭夫：《アジア？キリスト教史：中国・台湾・韓国・日本》，東京：教文館1981年版，第191页。

⑦ 日本基督教团宣教研究所教团史料编纂室编：《戦時下の日本基督教团：（1941—1945年）》（日本基督教团史資料集；第2卷；第2篇），日本基督教团宣教研究所1972年版，第316—326页。

岛、北京、上海等地，圣洁会也传到上海。^① 在东北地区，日本基督教是随着日俄战争传入的，1939年前后东北地区已经有8个日本宗派，教会40多个，信徒5500人。^② 这些教派的传教对象基本都是日本在华侨民，很少涉及中国基督徒。1933年9月，日本长老会牧师日匹信亮和山下永幸在东京组建满洲基督教会，开始对东北的中国人传教。不久满洲基督教会发展为南满、北满和热河3个教区，1938年3教区下辖教会已达15个。^③ 卢沟桥事变以后，山下等人将满洲基督教会改组为东亚传道会，除管辖原有的东北各教区外，又开辟了蒙疆、华北、华中、华南4个新的教区，从而将传教触角从东北地区一直延伸到海南岛，辐射范围涵盖了沦陷区的大部分。^④ 日本对中国沦陷区基督教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这些日本教派实现的。日本教派及其教牧人员打入沦陷区基督教系统内部，在日本军政势力的策划和支持下，实现了对原有基督教体系的控制和重组。

在东北地区，日伪统治下的东北新教教派林立、章法不一，颇不利于集中控制，日伪政权非常希望能够将各派联合起来，再施以统一的管理。1936年7月6至7日，伪文教部召集东北基督教各派代表20人召开座谈会，讨论基督教的统一管理问题。^⑤ 此时恰逢东北大会第26届会议召开，满洲基督教会领导人山下永幸邀请日本基督教联盟总干事海老泽亮到会演讲，二人均参加了文教部的会议，对官方的意见鼎力支持。事后山下宣称自己得到了日本军方及伪政府的准许，决定成立“满洲基督教联合会”。1936年12月1日联合会在沈阳正式成立，英传教士胡成国任会长，方德立、李毓麟任副会长，山下永幸、高光达、华茂山任干事，山下永幸掌握着联合会的实权。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的加盟教派13个，教会数达494个。其中长老会系统有309个教会，占62.53%强；而满洲基督教会的教会数只有15个，仅占3.04%。但因幕后有日伪政府的主使，这个仅占3.04%的宗派成为整个联合会的真正领导者。联合会的成立便利了日本对东北教会的控制，为东北教会进一步合一打下了基础。^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山下永幸回国，日本牧师石川四郎接替了他的职位。1941年12月17日，石川邀请满洲基督教联合会会长、东北大会总干事胡成国召开东北大会，改原来的教务会为临时措置委员会。会上推举石川为会长，全权代表东北大会向伪满政府联络办理一切事宜。12月31日，石川与关押在汇丰大楼中的英传教士邱树基和方德立订立合同，将教会所有房地产和部分资金移交给“临时措置委员会”。^⑦ 1942年3月27日，石川四郎在长春西五马路教会组建“满洲基督教会本部”，将东北基督教15个教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除外）合并在一起，划分8个教区，本部设在长春，至此日伪完全控制了东北教会。^⑧

在华北地区，集中控制中国教会的手段再次被采用，其过程同样不乏日本教会的参与。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教会组织随日军来到华北，管理侨居的日本教徒。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西方传教士尽遭逮捕，华北原有的教会系统遭到破坏。为了应付时局，华北教会于1942年4月18日成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中国教会习惯上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与北平、天津和青岛

① “Japanese Overseas Mission Work”, *The Japan Christian Year Book*, Vol 31(1933), p. 231

② N. Kobayashi “Christian Missions in Manchukuo”, *The Japan Christian Year Book* Vol 40(1940), p. 155.

③ 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编：《满洲基督教年鉴》，奉天（沈阳）：满洲基督教联合会1938年版，第178—181页。

④ 《宗教调查资料第7辑：基督教调查报告书》，（伪）民生部厚生司1940年版，第359页。

⑤ 满洲情报所编，滕铭译：《满洲的宗教》，《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1988年版，第212页。

⑥ 《大满洲帝国年鉴》（伪）满洲国通讯社1944年，第551页。

⑦ 孙鹏翥：《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怎样利用基督教为其侵略政策服务》，《辽宁文史资料》第7辑，辽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3年版，第116页。

⑧ 李廷魁：《东北大会报告书》，《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十届监事扩大会议记录》，中华基督教会刊行1946年版，第62页。

三市统称为华北中华基督教,新成立的联合会无形中成为华北基督教的领导机构。日本人利用这个现成的组织,通过多次施压,迫使华北教会于1942年10月15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成立华北中华基督教团。该团主理和执行委员虽然是中国教牧人员,但日本牧师村上治、织田金雄和日本政界要人河野静士、武田熙亦参与其事,日本人是教团实际的领导者。^①

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成立后,天津教会在日本教牧人员的控制下也被迫改组加入该团。1942年春,日本陆军特务机关专员饭野先与天津日本教团领袖、中村三郎牧师会晤。根据饭野的指示,中村三郎联合天津基督教联合会负责人刘修斋,于同年4月22日举行天津中日基督教领袖联欢会,宣扬中日教会合作,为成立新教团铺路。6月5日和7月28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天津分会和津海道区会先后成立。此后,天津教会被迫派员参加日本人组织的基督教讲习会,并参加了北京华北基督教团成立大会。在北京教团的压力下,天津教会于1942年10月24日改组天津分会和津海道区会为教团,是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天津分会。从1943年1月4日起,天津教团假东马路青年会合署办公,对外仍沿用两分会各自的名称,但组织机构完全合一,中村三郎等日本牧师同时兼任两会的顾问。这样日本教会通过华北中华基督教教团进一步控制了天津的教会组织。^②

除了以上两地区外,华东地区设立了华东基督教同盟和中日基督教协定会^③,西北地区组建了蒙疆基督教团^④,山东建立了山东中华基督教会^⑤,汉口成立了华中基督教团。^⑥这些团体组建的过程中几乎都有日本教牧人员的参与,可见日本教会配合日本侵略势力控制沦陷区基督教体系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些新成立的教团完全被纳入日本战时侵略体系,如满洲基督教会本部开展国民教化挺身运动、增产报国运动、储蓄报国运动、必胜防空体制确立运动、国民道义确立运动等所谓的“教化五大运动”^⑦,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展开和平祈祷、增产粮食、献铜献铁、成立唯爱服务部、教产处理等活动。^⑧教团中的日本教牧人员则成为这些运动和活动最直接的鼓吹者和领导人。

由上可见,建立教团是日本教会控制沦陷区基督教的基本方式,然而这并非是唯一的方式,其他的一些控制形式也不应忽视。其一是日本教会以旁观者的身份,公开或暗中策划中国教会改组。如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基督教青年会就在日本青年会金钱收买和政治施压软硬兼施的手段下,脱离中国内地青年会总会,成立日人控制的满洲基督教青年会。^⑨其二是拉拢部分中国基督徒新创中日联合教派。如1935年成立的奉天日满耶稣基督教会就是一个典型,该教派章程中通篇宣扬的都是“日满亲善”、“同文同种”等侵略理论,其宗教性质完全被浓重的政治色彩所淹没。^⑩还有一种情形值得一提,那就是日本政府直接派遣基督教团体移民中国,如1941年2月和1945年3月日本分别派遣了两批满洲基督教开拓团到中国东北圈占土地,进行农业开发。随着日本的败亡,开拓团

① 《成立概况》,《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成立周年纪念册》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本部1944年版。

② 霍培灵:《沦陷时期的华北基督教团》,《天津文史资料》第21辑,天津政协文史委员会1982年版,第165—173页。

③ 孟国祥:《日本利用宗教侵华之剖析》,《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第106页。

④ 《抗日战争中的河北宗教界》参见网址 <http://www.xs.k.cn/html/shgc/zgk/2005-10-23-19339.htm>。

⑤ 《鲁基督教会印刷新内容》,《新民报》1932年3月9日,转引邢福增:《王明道与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沦陷时期教会人士抵抗与合作的个案研究》,《建道学刊》2002年1月第17期,第9页。

⑥ 沈天然、李叔方、胡学汉:《武汉沦陷期间的华中基督教团》,《湖北文史资料》第3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⑦ 孙鹏翥:《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怎样利用基督教为其侵略政策服务》,《辽宁文史资料》第7辑,辽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3年版,第120页。

⑧ 霍培灵:《沦陷时期的华北基督教团》,《天津文史资料》第21辑,天津政协文史委员会1982年版,第177—181页。

⑨ [美]邢军著,赵晓阳译:《革命之火的洗礼:美国社会福音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919—193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

⑩ 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编:《满洲基督教年鉴》,奉天(沈阳):满洲基督教联合会1938年版,第195页。

大部分成员或死亡、或失踪,成为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牺牲品。^①

三

充满仁爱与和平精神的基督教会,何以沦为军国主义的附庸,成为侵略势力的帮凶?这是一个很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我想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对社会的严密控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时社会舆论被政府掌控,人们的思想遭到钳制,很多具有反战思想的人士都遭到了镇压,基督徒被捕者也不乏其人,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和平主义者是很难与政府对抗的。正如一位日本基督徒所言:“我相信日本基督教领袖将首先承认我们比应做的做得不够,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有时很难理解其他地方的基督徒兄弟的批评,这些批评是基于对日本基督徒所处环境的肤浅的认识而急于做出的判断,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有失公平。”^②

另外,日本军国主义者严密地控制着日本的社会舆论,其歪曲事实的鼓动宣传迷惑了大部分日本民众,人民很难有其他的渠道了解事实真相,这难免也会让日本基督徒困惑。正如一位日本基督徒在九一八事变后致中国教会的信中所言:“我们切切的愿意知道中日事件的真相,尤其是这次满洲及上海的事变,因为我们国内是无法知道的。”^③1932年另一位日本基督徒也指出:“不幸的是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而且两个故事在许多关键细节上是矛盾的。单方面的观点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应该非常小心,因此不要急于总结出结论。正如基督徒认识的以往双方都有正当的理由也都有错误一样,我们应该尽最大可能寻找事实,联合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制定出真正建设性的方案,使这些在中日都在升温的难题得到双方满意的解决。”^④可见,舆论控制导致不明真相是日本基督徒判断失误的重要原因。即便少数基督徒能够认清事实也无法左右大局,“曾有数团体联名向政府当局恳切奉劝,勿施武力行动,无奈新闻报纸均为军人所把持,教会之宣言社论无从发表”。^⑤

但是,被动的政府控制并不能解释大批日本基督徒积极投身侵略战争的事实,事实上日本基督教界自觉自愿地接受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主动地迎合战争更符合历史真实。一位作者就个中原因如此论道:“一定不能忘记日本牧师、教师和俗人不仅是基督徒,而且还是日本人,他们的童年教育和家庭生活都是日本式的,成年以后也受着同样势力和力量的影响,这样就形成日本国家的思想、性格和习惯模式。”^⑥这种看法非常有道理,日本基督徒首先是日本人,不可能超越日本人的固有思维,当世俗利益与宗教信仰发生冲突时,宗教信仰往往要服从世俗利益。与中国一样,日本在近代也曾受到欧美国家的压迫,这种积怨一直存留在日本人心。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大增,逐渐摆脱了列强的控制,走上了富强的道路。日本的野心也随之增大,希望能够与欧美国家争夺亚洲的利益,他们不断宣扬白种人对黄种人的欺压论,引起日本民众的愤怒,这也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一个基础。日本基督徒热爱自己的国家,希望日本繁荣富强,他们自然会支持日本的国策,

① [日]韩哲曦:《日本の満州支配と満州伝道会》,第108页。有关开拓团的详情亦可参见日本基督教团宣教研究所教团史料编纂室编:《戦時下の日本基督教団(1941—1945年)》(日本基督教団史料集;第2卷;第2篇),第326—331页。又见堀井順次:《敗戦前後:満州キリスト教開拓団長の手記》,静山社1990年版;榎本和子:《エルムの鐘:満州キリスト教開拓村をかえりみて》,暮しの手帖社2004年版。

② Soichi Saito “The Japanese Church and the World Situation”, *The Japan Christian Year Book* Vol 39 (1939), p. 169

③ 《国际通信的一页》《真理与生命》1932年4月第6卷第6期,第53页。

④ Soichi Saito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Recent Events in Manchuria”, *The Japan Christian Year Book* Vol 30 (1932), p. 32

⑤ 寒心(译):《一封日本基督徒致诚致怡博士的信》《真理与生命》1932年3月第6卷第5期,第58页。

⑥ Charles H. Gernany, *Protestant Theologies in Modern Japan: A History of Dominant Theological Currents from 1920—1960*, Tokyo: IISR Press, 1963, p. 158.

修正自己的信仰,使其与国家目标一致。又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会寻求与其信仰有关教义去理解他们的国家、体制和目标。某传教士曾经这样评价战争时期的日本基督徒:

西方和中国的许多人问我们,在制止对华军事行动方面日本的基督徒在做些什么。在此关头日本基督徒没有被号召做任何制止侵略的事情,他们被要求为一些事情制造证据:各国在日内瓦对日本不公平的外交、中美呼吁的伪善等等,这些与基督教没有任何关系,虽然其发言人可能是基督徒,甚至宣称在用基督教的名义讲话。只有那些理解日本思想这个方面的人才能正确地察觉日本教会所遇到的困难和时机。^①

这一评论应该说大体是比较中肯的,不过还应该略作补充,那就是在更多时候日本基督徒自觉自愿地遵照政府要求行事,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军国主义蒙蔽的结果。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仍旧掩人耳目地宣布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虽然其野心早已昭然于天下,但日本民众却仍为其宣传所迷惑。日本教会坚持认为:“国家政策在政府的声明中自动揭示出来,政府宣布它没有侵略计划,没有领土野心和赔款要求,仅仅是要建立远东新秩序。政府方面的这种态度为基督徒支持和解释基督教原则创造了良机,利用一般思维的趋势,以便基督教思想可能被作为建立东方新秩序的指导思想。”^②大多数日本基督徒并没有认清军国主义的本质,正如日本著名的基督教史学家土肥昭夫所说的:“在东亚的民众看来,日本基督徒是战争的袒护者和同案犯,但当时的日本基督徒并没有想到要对亚洲人民犯罪,与之相反,他们相信日本是正义的,以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会给亚洲带来独立与和平。”^③美好的愿望并不一定会带来美好的结果,战争时期日本基督徒的行为值得后人深刻反思。

(作者徐炳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讲师)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M. S. Muraq "What Christianity Means to Japanese Students", *Student World* Vol 26 p 212 转引 Charles H. Gemany, *Protestant Theologies in Modern Japan: A History of Dominant Theological Currents from 1920-1960*, Tokyo IISR Press 1965 p 159.

② Akira Ebisawa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and Its Work", *The Japan Christian Year Book* Vol 39 (1939), p. 255

③ 吴利明、郑兕玉、閔庚培、土肥昭夫:《アジア? キリスト教史:中国・台湾・韓国・日本》,東京:教文館 1981年版,第 192页。